

“党报姓党”的实践逻辑

——基于《抗战日报》的一项微观考察^①

岳谦厚(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

乔傲龙(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

内容摘要: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晋绥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沙漠。1940年初中共开始独立主政晋绥根据地,并在人财物力匮乏、生存面临威胁的条件下,经过努力动员,组织起一个相对完整的新闻出版体系;其中《抗战日报》是其意识形态部队的“压舱石”。该报在中共中央“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号召下,在晋绥边区建立了规模庞大的通讯网络,将数以千计的“大老粗”培养成舞文弄墨的报纸作者,将无数文盲半文盲改造成报纸的忠实读者或听众,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而“群众路线”和“全党办报”的实践过程不仅是党报自身的有机化改造过程,更是以党为中心统一民众意见的过程——通过深入广泛的文化动员,中央意志成为全党意志,党的意志成为全民意志,整个根据地结成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政治共同体,基层民众卷入到抗战与革命的洪流中,为中共最终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晋绥边区 《抗战日报》 全党办报 党报姓党

中共一贯重视报纸的作用,办好报纸不仅是重大问题且具有“原则意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1983:150)全国抗战初期各根据地创

^①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太行山和吕梁山抗战文献整理与研究》(16JZD035)阶段性成果。

办的报纸尽管依靠少数办报人才艰难支撑,但因良好的政策,很快吸引大批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奔赴于此,加上通过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的一批本土文化精英,逐步形成人才济济的局面,到1940年9月《抗战日报》创刊时,已建立起晋察冀、太行、太岳、晋绥四大党报同声相应的大格局,并成为动员民众、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有力手段。1942年整风运动之后,中共提出“全党办报”号召,各地党报在党组织和各级政权支持下相继建立了深入基层民众的通讯网络,将新闻触角伸向广大农村,在汲取优质新闻资源之时将党的意志贯彻到群众之中并使之成为“全民共识”。因此,中共报纸抛开新闻自身勿言,仅就报纸功能尤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而言,是其他任何民间报纸或党报无法望其项背的。作为中共报纸阵营中的佼佼者之一,中共晋西区党委(1942年8月后改称中共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创办于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终刊,历时9年共出版2171期(以下统称《抗战日报》)。

晋绥根据地山河关隘纵横交错,境内平绥、同蒲两条铁路均掌握于日伪之手,交通手段处于原始状态,基本靠步行或借助畜力;通讯技术落后,除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和新华社分社个别电台外,日常通讯以信函邮递为主;民众文化水平低下,十之八九为文盲半文盲;加上日伪长期包围和不间断“扫荡”,有的村与村间鸡犬之声相闻而往来不能自由。在这里,办报缺少作者,看报缺少读者,印刷所需设备和纸张油墨等材料匮乏,送报靠人扛马驮,就传播媒介生存和发展所需各类要件而言可谓寸草难生之地。然从晋西事变后独立主政晋西北起,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武装力量在这样一个文化沙漠中经过努力动员,组织起以《抗战日报》《晋西大众报》《战斗报》及新华社晋西北分社、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为骨干的新闻出版体系,各种书籍、报纸、刊物大量发行,对于宣传马列主义及中共路线、方针、政策并推动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其中,《抗战日报》作为这个文化方

阵中的“压舱石”,对根据地社会动员居功厥伟。该报不但组建起一支坚强可靠的采编队伍,且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号召下,自上而下地建立健全了以报社、分区通讯科、县委通讯干事、基层通讯组为组织框架,由千余名各级各类通讯员组成的覆盖全边区的通讯网络。同时,又将数以千计初识字甚至不识字的“大老粗”培养成舞文弄墨的报纸作者,将无数文盲半文盲改造成报纸的忠实读者或“听众”,并使报纸融入生活之中,用一张四开四版、发行万余份的报纸搅动整个边区社会,做活了一盘社会动员的“大棋”,将数以百万计边区民众卷入减租减息、参军参战、变工互助、劳武结合、民主村选、清算反霸、生产支前、土地改革等群众运动中。总之,“在黄河两岸的沟壑山村里,这家近代新闻舆论工具冲破穷山恶水,把党和人民的声音播向远近各方”,“组成了共产党在农村办报而影响全国的奇观”。(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276)故考察中共在根据地创办党报的活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抗战日报》的创办

兵马未动,舆论先行,“笔杆子运动”是所有革命政党的共性。就中共而言,拿笔杆子要早于枪杆子,武装斗争是大革命失败后之事,而笔杆子运动尤其办报办刊则从大革命时期到1949年后始终被视为社会动员的重要手段。考诸历史,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中共坚定不移地通过出版报刊进行社会动员。抗战时期的晋绥根据地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拿出边区一级机关开支的30%用作《抗战日报》社办报经费(康溥泉,1984)。晋绥如此,其他根据地或解放区亦如此。

1.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全面抗战爆发特别是八路军东渡黄河之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牺盟会、战动总会在山西各地均积极创办报刊,动员民众抗日救国。

1937年12月创刊的《晋察冀日报》(原名《抗敌报》)是中共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创办的党报,而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亦于1939年初创刊。在此之前,太行山根据地已有中共报纸,如1938年创刊于屯留的中共晋冀豫特委机关报《中国人民》和创刊于和顺的中共晋冀特委机关报《胜利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后两报分别于1939、1941年并入。(穆欣,1992:9、17)在晋西南地区,1938年5月25日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在孝义创办《五日时事》报,1939年底晋西事变后迁往晋西北并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继续出版,1940年《抗战日报》创刊前停刊。(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161)在晋西北地区,1938年八路军一二〇师在岢岚恢复红二方面军时期的《战斗报》作为军内报纸。在此前后,三五九旅创办《战声报》、三五八旅创办《战线报》《战线画报》,但发行限于部队而不向社会公开。1939年夏,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以八路军一二〇师民运部名义创办《战地烽火》,这是晋西北重要的出版物之一。(山西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等,1997:18、21、75—82)不过,这一时期晋西北尚无中共报纸。出于在统一战线中拉住阎锡山及群众动员形式合法性的考虑,许多中共组织尤其与友党友军共存的晋西北、晋西南地区党组织尚处秘密状态,“办报办刊单位,除了有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外,主要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戴阎锡山的帽子’‘讲山西话’的革命群众团体,即战动总会及其在各县的动委会,牺盟会的各级机构,还有一些进步的文艺团体”。因此,此时晋西北最引人注目的是由牺盟会和战动总会等在各地创办的报刊,“在晋西南和晋西北,各种油印刊物,真可谓蓬勃发展,遍地开花。现在尚能数起报刊名称的即有50余家”。如1939年牺盟会晋西北办事处在岢岚创办的《新西北报》,1940年《抗战日报》创刊后并入其中。(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164—167)牺盟会各中心区亦纷纷办报,如临县中心区《西北战旗》、岢岚中心区《黄河日报》、太原中心区《太原战旗》等。(康溥泉,2005:299)山西新军领导机关第二战区政治部创办《政治周刊》(1939年9月更名《黄河战旗》),新

军一、二、三纵队分别创办《行军日报》《长城》《铁军》，在晋西北的决死四纵队出版《前线报》《前线》《前哨》《广播台》，工卫旅办有《工卫报》，暂编第一师创办《长城报》《战地快报》《萌芽》。（山西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等，1997：21）战动总会1937年9月在太原成立之初即在阎锡山控制的《山西党员通讯》报上编发《总动员》副刊，并在《太原日报》开辟《动员》副刊。太原沦陷后，续范亭率战动总会进入晋西北，1937年冬在离石创办油印《战动通讯》，填补了敌后看不到报纸的空白，该报一度停刊，后又复刊，共出版182期，之后又在离石出版《动员》半月刊，是晋西北唯一的铅印综合刊物。转移到岢岚后，又与一二〇师民运部（实际即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牺盟会岢岚中心区、山西保安二区政治部、晋西北农民救国联合会等联合创办间日刊《西北战线》，之后停刊并恢复《战地通讯》。在岢岚时期，还出版过《战动周刊》，周刊停办后恢复《动员》半月刊，后改为《战地动员》半月刊。战动总会宣传部创办了以工农群众为主要对象的《老百姓周报》《战动画刊》两份油印通俗报纸。（穆欣，1992：297—299）

在晋西北，各县战动组织都编有油印报纸，有的不只一份。据穆欣统计，有临县《战旗》、五寨《动员》、岚县《岚动》、岢岚《抗战建国》、宁武《汾旗怒吼》、神池《火花》、河曲《雪耻》、保德《自卫》、兴县《抗战》、忻县《战声》、静乐《战潮》、偏关《怒吼》、右玉《抗日先锋》，以及战动总会雁北办事处《炸弹》。另有《抗战形势》《战斗救亡》《农村救亡》等刊物。同时，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晋西北支部出版《先锋》半月刊。（山西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等，1997：21）这一时期报纸虽大多为油印且出版时间短，但数量可观。据康溥泉回忆：山西抗战初期编印的各类抗日报纸约有240种、杂志100多种，1939年全国报刊展览上山西有300多种参展。（康溥泉，2005：300）至于晋绥地区，据现有资料，1937—1949年间至少出现过大大小小油印、石印、铅印报刊100余种，出版各种图书400余种。（山西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等，1997：17）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共根据地报纸尚未形成晋察冀、太行、太岳、晋绥四大局级分局级党报并存局面,然正如其在社会动员中将自己组织隐蔽在牺盟会和动委会之中、组织建设通过牺盟会和战动总会进行一样,牺盟会和战动总会创办的报刊尤其在根据地创办的报刊实际都在中共掌控中。以《新西北报》为例,1939年战动总会被阎锡山下令撤销,当时尚处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晋西区党委负责人刘俊秀和战动总会组织部长南汉宸与之后负责创办《新西北报》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晋西北队部负责人吉喆谈话称:战动总会《西北战线》将随战动总会撤销而被迫停办,但中共宣传动员工作不能中断,因此要求吉喆以牺盟会名义筹办一份新报即《新西北报》。由此看出,《西北战线》就是出于共产党宣传动员工作的需要而办,战动总会被撤销后《新西北报》作为《西北战线》替身,总编仍是吉喆,使命一如既往,同样是在中共党组织直接策划指导下出版,只不过名头由战动总会变成牺盟会西北办事处。吉喆回忆说:“《新西北报》实际上是中共晋西北区党委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报纸,当时为了照顾统一战线关系,名义上由牺盟会晋西北办事处主办的,这样在对外说话方面就有些讲究,以利于争取更多的同盟军同情分子的拥护。”报社内部设有党组织,起初为小组并由吴子牧任党小组长,后设党团且由吉喆任党团书记并受中共晋西区党委(晋西北与晋西南两个区党委合并而成)领导。《抗战日报》创刊后中共在晋绥地区有了自己的党报,《新西北报》人员与器材全部并入。(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164—167)再如《牺牲救国》,1936年冬创刊时中共党组织派赵石宾从北平回到太原参加牺盟会宣传委员会工作并负责编辑《牺牲救国》。次年,牺盟总会成立秘密党组,总会负责人牛荫冠任书记,赵石宾作为3名成员之一分管宣传。显然,《牺牲救国》名义上是牺盟总会刊物,实际是党的组织在管、党员在办。1939年撤到陕西宜川秋林镇后,牺盟总会党组统一领导牺盟总会、第二战区政治部、山西绥署政治部及牺盟会和新军的宣传机关黄河出版社工作,赵石宾任《牺牲救国》和黄河出版社总编辑,这

样则《牺牲救国》、黄河出版社整个办报办刊都置于中共领导之下。晋西事变后各类统战刊物纷纷停办,赵石宾从宜川经延安到达晋西北,党员身份由秘密到公开,担任中共晋西区党委宣传部编审科科长,开始筹办根据地文化事业,《抗战日报》创刊后成为第一任总编辑。(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283—285)至于各县动委会办报办刊,既然其是八路军和中共地方组织推动成立并由中共党员担任领导,故这些刊物虽“对外说话方面就有些讲究”而所发出的无疑是共产党的声音。总之,战动总会、牺盟会、山西新军这一时期所办报刊与共产党组织所办刊物一样都是中共宣传和动员工作的组成部分,在1937—1939年国共合作蜜月期,这些统一战线报刊实为中共不方便出面说话时的“代言人”。

2. 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创刊

太原沦陷后,阎锡山完全丧失对晋东北、晋东南地区军事行政控制,根据当时中共华北局对各地党组织指示,在这些既“未被敌人占领”又无“友军友党和其他政治团体”需要联合的地区,共产党和八路军可独立地发动并领导群众运动而无须顾忌阎锡山或其他势力,故晋察冀根据地1937年底创办《抗敌报》、华北局1939年初在晋东南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而同蒲路以西地区则大不一样,阎锡山退守的晋西南地区活跃着八路军一一五师和总政民运部,八路军一二〇师驻扎的晋西北地区不但有第二战区部队且存在阎锡山政权,中共在上述统战地区须应对复杂情况、处理微妙关系、把握彼此平衡,公开以党报形式对民众进行宣传动员难免有“赤化宣传”之嫌,影响与阎锡山的统战合作。因此,转移到太岳的北方局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晋西南区党委机关报《五日时事》只能“作为区党委和下面联系的渠道”存在,更多时候以战动总会和牺盟会刊物代言发声。(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162)

1939年底发生的晋西事变虽因统一战线需要而和平处理,但双方本就脆弱的互信出现更深裂痕,作为统战工具和双方合作桥梁的牺盟会和

战动总会被阎锡山撤销,新军表面上依旧拥阎抗日而实则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此时,一方面牺盟会和战动总会不再具备代言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晋西北不再有友党友军存在,独立自主地动员和领导群众不但可行且必须。于是《新西北报》《五日时事》停刊,于1940年“九一八”纪念日创刊的《抗战日报》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诞生,尽管初期仍以统一战线面孔出现,但随1942年整风运动发动而与前大不相同,它具有了坚强的党性。正如贺龙所言,有了《抗战日报》,“我们的阵容更整齐了,我们的力量更雄厚了,我们的精神更焕发了,我们的意志愈加成为不可战胜的了”,“抗战日报有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广布新民主主义的光华,团结着全晋西北的群众,奋斗前进”。(贺龙,1941)至此,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太行、太岳、晋绥四大党报同声相应的大格局形成,共产党办报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从“三三制”到“在地化”:晋绥“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初期,该地区基本是一个文化沙漠,知识分子凤毛麟角。据中共晋西区党委统计资料显示:20世纪40年代初,在区和分区干部中,大学生和文盲半文盲各占10%左右,各县县长六成以上为中学学历,县里干部50%以上是小学毕业,各区区区长70%以上是小学、2.6%是文盲,村干部则以文盲半文盲为主。(岳谦厚、董春燕,2009)而成功的群众运动必然是思想上觉悟了的群众的自觉运动,群众的觉悟离不开宣传,宣传不能没有报纸,办报又需报人。晋绥本地知识资源先天不足,故1940年初《抗战日报》筹办时,尽管中共组织及其武装力量扎根于此已两年有余,牺盟会和战动总会从太原及全国各地带来不少知识人才,其依然面临“一个编辑和一个记者甚至比一个有实际工作才能的干部还要缺乏”的困境。(廖井丹,1941)《抗战日报》出版时只有少数几个编采人员,专门记者仅三两人。八年后的1948年5月晋南全境解放,

《晋绥日报》社即从《晋绥日报》《晋绥大众报》两报编辑部抽调郁文、阮迪民、邵挺军、张惊秋、富文等一批骨干力量南下晋南工委创办晋绥根据地第一份城市报纸《临汾人民报》(后名《晋南日报》)。而此时经过多年惨淡经营之后,中共在晋西北当地培养起来的一大批新闻人才已堪当大任,由于其及时递补,虽然两张报纸变成三张,但依然正常出版。1949年5月,《晋绥日报》终刊,全体编辑人员及印刷发行骨干再度南下,与先期创办《临汾人民报》的人马会师临汾后兵分三路各赴使命。一路由太原绕道武汉随二野西向入川,在重庆创办西南《新华日报》及新华社西南分社;另一路随第十八兵团由陕西入川创办《川西日报》;第三路随一野挺进西北先后创办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党报。(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48、66、68)此时,继续留守晋西北《晋绥大众报》的,除总编辑张友外基本上都是各县调来的县委通讯干事,清一色晋西北口音,当年7月《晋绥大众报》终刊后其一部分南下,另一部分参与《山西农民报》的创办。(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246)因此,《抗战日报》不仅是中共在晋绥根据地进行社会思想动员的“意识形态部队”,其自身发展壮大本身就是中共在晋西北社会动员的成果之一。

1. 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抗战日报》最初的新闻业务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但除交城籍的常芝青和保德籍的陈之向外,无一个晋西北人。这批最初的播火者无论是从军队或地方政权中抽调来的“老革命”,还是从大后方“万里赴戎机”并在延安经过马列学院、抗大、陕北公学、鲁艺培训后派到晋绥的“新青年”,绝大多数是外乡人。可以说,中共在晋西北新闻事业最初的火种是从外部移植而来的。在《抗战日报》先后担负领导及参与创办该报的骨干业务人员有赵石宾、常芝青、廖井丹、周文、郝德青、赵仲池、穆欣、郁文、高丽生、阮迪民、汪涛、高锡嘏、陈之向等人,考诸其履历不难发现,这批新闻精英大多是中共在1927年之后国共对立时期组织动员起来的

知识分子(见下表)。

《抗战日报》历任领导

| 姓名 | 籍贯 | 入党时间 | 学历 | 所任职务 |
|-----|----|-------|---------|-----------------|
| 赵石宾 | 山西 | 1933年 | 国立山西大学 | 总编辑 |
| 常芝青 | 山西 | 1932年 | 北京平民大学 | 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总编、社长 |
| 廖井丹 | 四川 | 1937年 | 西南大学 | 社长 |
| 郝德青 | 山西 | 1928年 | 北平师范大学 | 社长 |
| 赵仲池 | 山西 | 1933年 | 天津北洋大学 | 总经理 |
| 周文 | 四川 | 1930年 | 川康边政训练所 | 社长 |
| 陈之向 | 山西 | 1936年 | 太原第一师范 | 党支部书记 |

资料来源: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康溥泉(2005);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03);张稼夫口述,束为、黄征整理(1984);山西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等(1997)。

相关史料表明,《抗战日报》领导层虽此前或多或少都有过办报办刊新闻从业经历,如赵石宾和穆欣等人,他们与大后方著名报人相比毫不逊色,但这些人中无一人是职业报人。常芝青担任过战动总会除奸干事和抗日游击县长,廖井丹和郝德青担任过新军指挥员,赵仲池指挥过对日作战,赵石宾是牺盟会中共组织骨干,周文参加过“左联”领导工作(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03:56),故与其说他们是报人或文化人而勿宁说他们都是职业革命者,至于革命的方式是扛枪还是抓笔则视组织需要而定。总之,在他们身上,共产党人与报人、革命与办报是“体”“用”关系。同时,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在青年时代参加过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通过中共领导下的外围团体如左联、共青团、学生会等被发展为党员,除廖井丹外其余6人均在1927—1937年国共对立时期从事过白区地下工作。(穆欣,2007)也就是说,他们早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就已经历过殊死斗争

的考验并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廖井丹入党晚些,但红军长征时期就在四川组织过红军之友社,全国抗战初期已是中共在新军中的骨干。(李洪启,1987)这批知识分子不但是开辟建设根据地的文化先锋、带动新进的党外知识分子政治素质提升的关键支撑,同时也是在根据地撒播新文化种子的拓荒者和开展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2.“三三制”与《抗战日报》首发阵容

1940年是晋绥根据地建设的分水岭,此前在该地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共统一战线关系随晋西事变结束而被双方南北分治的新格局取代。《抗战日报》在9月18日创刊则使这一年又成为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分水岭,之前的《五日时事》原本是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机关报,事变后才迁到晋西北继续出版,《新西北报》《牺牲救国》虽受中共实际控制,但毕竟以战动总会和牺盟会名义即第二战区的牌子刊行。因此,《抗战日报》的创刊标志着中共在晋绥根据地开始独立发声并努力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引导社会生活。

《抗战日报》筹备和初创时期因人员很少,不但采、写、编之间无明确分工,各层领导与基层一线间亦无明显界线,是一种所有人做一切工作的状态。(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66)工作人员中除前述赵石宾、廖井丹、赵仲池、陈之向等人外尚有下列人员:

穆欣是采访通讯部第一任主任,亦是根据地大笔杆子。穆系河南扶沟人,最高学历是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故一直视《抗战日报》为“我的大学”。(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97)1937年,他到山西的第一站是牺盟会军政训练班,7月入党,后到决死二纵队做政治工作。1938年,他随部队调往第六专署,因在学校读书时给报纸写过新闻、通讯,专署就将创办报纸之事交给他。6月7日,《战斗周报》在汾西创刊,9月1日更名《战斗三日报》,一年后印数由200份增加到2000份并改间日刊。报社附设战斗通讯社,供稿单位最初仅限《牺牲救国》《政治周刊》等,后

来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国讯》月刊、重庆《新华日报》、各战区《阵中日报》《前线日报》等都大量采用该社新闻。(穆欣,1939)由于作为“西战场”的山西前线举世瞩目,该社深受中外新闻界关注,“所发稿件虽然数量有限,水平不高,还是受到有关报刊的欢迎”。1939年春,经六专署、中共洪赵特委、决死二纵队、中共设在牺盟会洪赵中心区的党组织同意,穆欣又接受第二战区民族革命通讯社吕梁分社社长一职,该社由第二战区司令部秘书梁延武任社长,除山西各地外在香港、重庆、成都等地设有分社,一时人才济济,常芝青、段云、仓夷等均参与其中。“在山西政局逆转之前,民革总社所编发的电讯、通讯稿件,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反映山西前线的战争面貌,比较客观公正地报道八路军三大主力进入山西战场以后,在山西新派和人民群众支持下,依据太行山、五台山、吕梁山、管涔山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起了有利于团结抗战的作用。”(马明,1999:20—24)晋西事变爆发后,穆欣于1939年11月到达延安,此前曾邀其加盟国际新闻社的范长江从重庆通过内部交通捎来一封长信称,经周恩来同意,国新社将在晋西北设立分支机构,拟由穆欣任特派员兼通讯站主任。(穆欣,1992:359)国新社是全国抗战初期在中共领导下建立的新闻通讯社,总社在桂林,重庆设办事处,香港设分社,各重要地区设通讯站,受中共南方局领导,社内有党支部,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查封。1940年5月,穆欣到达晋西北后一边参与筹办《抗战日报》,一边为国新社采访,报纸创刊前的8月1日国新社晋西北通讯站正式成立。(马明,1999:25—26)《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作为革命者的穆欣党龄虽仅3年,但作为记者已有过独立支撑一个颇有影响力的通讯社和一张堪称优秀的战地报纸的经验,并担任过或仍担任两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通讯社的地方负责人,在《抗战日报》内部可与之比肩者,除赵石宾外恐无他人,故穆欣成为该报最重要的业务部门之一的采访通讯部首任主任。

高丽生是《抗战日报》筹办时的骨干,亦是报纸初创时为数不多的记

者之一,1947年关于刘胡兰的报道即是其从来稿中发现、整理并及时编发的。高是广东人,自幼家贫,只上到中学,少时通过邹韬奋主编的进步刊物接受新思想,中学毕业后受到革命报人冯剑南影响,参加其组织的抗敌救亡同志会。全面抗战爆发后入党,1938年辞去小学教职,从广东奔赴延安并进入抗大学习,其间因文才而受关注,有不少作品在延安报刊发表。1939年冬被派往晋西北,在赵石宾、常芝青领导下筹办《抗战日报》,后曾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副社长、总编辑,1949年该报停刊后随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并在廖井丹任社长的新华社西南总分社任副社长主持日常工作。(黄羨章,2016)

另一位业务骨干是被毛泽东称为“当代梁山阮氏兄弟”的阮迪民,从《抗战日报》到《晋绥日报》要闻版一直由其主持。(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03:108)其是《抗战日报》接生者之一,1940年3月晋西区党委决定停办《五日时事》《新西北报》并着手筹办铅印新报时,阮就是赵石宾和常芝青班底成员,直到1948年临汾解放,该报抽调人马筹办《临汾人民报》时才离开晋西北。(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48)和高丽生一样,阮迪民未上过大学,战前是小学教师,在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上学时深受陶行知进步思想熏陶,全国抗战爆发后从临安老家千里奔赴山西前线,在民族革命大学入党。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二战区政治部宣训科编辑《政治工作》(后名《黄河战旗》),晋西事变后奉组织指令撤回延安。(李振水,1990:502)阮的这一段履历与赵石宾重合,当时赵作为中共设在牺盟会的党组成员,任宣训科副科长,负责《政治周刊》等刊物,晋西事变后经延安到达晋西北。(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125—133)赵石宾筹办新报,老部下阮迪民成为其左膀右臂。

汪涛于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老家广东汕头潮阳县参加青抗会并任乡抗日工作团主任、抗日短期小学校长,1938年与新婚妻子石虹经香港到广州,并经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同年入党。1939年被派到晋西北,1940年夏秋之际报纸还未创刊就已受赵石宾派遣以“特派记者”

名义到晋绥八分区采访。(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285)

《抗战日报》创刊前就已牺牲的筹备者高锡嘏是山西榆次人,出生士绅之家,未受系统教育,当过学徒和兵工厂描图员。1936年秋牺盟会成立初即加入,同年加入中共组织。1937年8月日军轰炸太原时负伤,次年任民族革命大学政治指导处宣传科长,参与校刊编辑工作,是该校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晋西事变后,高锡嘏奉命组织中共党员、牺盟会员和进步师生撤回晋西北和延安。1940年2月调到晋西北参加《抗战日报》筹备工作,之后被派到八分区组织通讯网络并购买印刷设备和器材,因汉奸告密在汾阳被日军杀害。(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286—288)

上述9人组成《抗战日报》从筹备到初创时期新闻业务方面的基本阵容。其中,全面抗战爆发前即有大学学历者3人,余为抗大、陕公等培训过者及师范学校或相似学历者,这在整个根据地独一无二。虽然新闻业务水平有别,但除高丽生外均有办报办刊经历。9人全是中共党员,且绝大部分在入党前参加过中共领导或受中共宣传影响的学运或其他形式的救亡活动,这亦是战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加入中共组织的途径。(黄羨章,2016;李振水,1990:502;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125—133)从《抗战日报》首发阵容看出,这一时期由于中共在晋西北培养知识分子的行动尚在初始阶段,从各地奔赴包括晋西北在内的华北各根据地的知识分子数量有限,大批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尚在后方的抗大、陕公、鲁艺、中央党校等“熔炉”锻造,故此时在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新闻队伍中,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并入党的知识分子仅占1/3,而战前入党者占2/3的绝对多数。在此2/3中,国共对立时期储备的固有文化人才和战前通过牺盟会等统一战线组织新近发展的知识人才各占半数,从而形成三个时期各1/3的人员构成。

三类知识人才共同组成的队伍因资历和业务水平不同而呈现出有规律的梯次结构。首先,国共对立时期入党的固有知识分子不但政治上

可靠、经验丰富且大多学历较高,多数处于领导层。其次,战前通过统一战线发展的知识分子,因1937—1940年间复杂的军事文化斗争的考验,各方面均比较成熟。因此,名牌大学毕业、入党较早又在决死纵队担任过指挥员、后在中央党校进修并在中央机关和晋绥军区锻炼过的廖井丹被任命为社长,而抗战初即从事新闻工作并对通讯社和报纸稔熟,且对大后方国统区、阎统区和根据地新闻事业比较了解的穆欣被任命为《抗战日报》最核心的业务部门采访通讯部的主任。最后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其虽在延安接受抗大、陕公培训教育或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初步业务技能并入党,但这些人斗争经验不足,还须在实践中不断磨炼,对于办报或只有初浅技能或新闻经历为零,如汪涛在《抗战日报》筹备阶段被赵石宾安排组建资料室时,对“资料”为何物尚不知。(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50、128)因此,一般只能作为基层和一线人员使用并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培养提高。总之,《抗战日报》筹备和初创阶段的人员,无论是国共对立时期动员和储备的固有文化人才,还是抗战前来到延安或山西并加入中共组织的知识青年,都已根本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有着自觉身份认同和阶级归属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个由革命政党的有机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办报集体,在根本上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所创办的同人报纸,后者更多出于泛泛的政治理想,前者则是为了直接的战斗目的。换言之,它不仅是一张报纸,更是一种武器,他们不仅组成一个报社,更组成一支意识形态部队,正如贺龙在该报创刊一周年纪念刊上的署名文章《强有力的武器》所称:“我们多了一个抗战日报,就是增加了一种新的装备,使我们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卫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贺龙,1941)

3.《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1941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华北各根据地报纸数量多、质量差的问题提出批评,要求除必办一种政治报纸和一种通俗报纸外,须将主

要精力放在报纸质量而非数量上。关于质量问题,要求各地除加强通讯工作以使报纸更好地反映当地实际外,须想方设法搜集并有计划地培养专业新闻干部以解决人才紧缺问题。^①就《抗战日报》而言,初创时期四个版面中,二、三版全部刊登国内外新闻,第四版副刊上发表和转载一些与本地无直接关系的大块头文章,本地新闻仅占第一版除社论外的版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如编辑部缺乏在根据地办报经验,而在办报方针上沿袭城市做法,但主因在于人手紧张导致写稿缺人、基层无根导致无稿可写。(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7)要纠正中宣部所批评的“无的放矢和空谈的缺点”,并解决“质量差”和“形式铺张、内容贫乏”等“严重弱点”,就须在地方稿源上下功夫。^②而在广泛的通讯网络建设起来之前,稿源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培养更多的编辑记者。

事实上,在中宣部指示之前,中共晋西区党委和《抗战日报》社就意识到上述问题,并开始为新闻地方化努力。首先是1941年5月和1942年5月两次改版。1941年5月1日第一次改版后一版仍是社论和要闻,四版副刊仍是专文,但对二、三版做了较大调整,之前两个版面均为国际国内新闻,改版后二版为国内国际混合新闻,三版全部刊登地方新闻,也就是地方新闻除原有第一版部分版面外又增加整整一个版面。9月,在报纸创刊一周年之际,《抗战日报》进一步要求:除地方新闻必须联系根据地实际外,国内新闻须“按照根据地的特点”以是否有利于“推动晋西北军民的斗争”为方针,副刊首先要反映当地实际,其次再讲文字水准。此时,《抗战日报》已将新闻采编工作聚焦于当地。1942年5月19日第二次改版后,头版由社论和要闻变成“地方重要新闻和社论”,第四版副刊要么讨论地方各种实际工作、要么是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文学作品,地方化的编辑指向更明确且对地方新闻和国际国内新闻版序进行对调,地方新闻放在第二版、国际国内新闻放在第三版。(晋绥日报简史编

① 《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共产党人》,1941年8月。

② 《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共产党人》,1941年8月。

委会,1992:7、8、10)当天社论《为改版告读者》称:“作为根据地的报纸,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能针对根据地实际情形,团结广大人民,组织一切力量,以实现根据地的政策法令和工作任务。”并向读者承诺今后的努力将从当下不足开始。^①与此同时,为有效获取来自基层和各地的信息,《抗战日报》创刊不久即开始通讯队伍建设的努力,并于1941年春成立采访通讯部,采通部下设通讯联络科,专门负责与通讯员联系。(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83)在报纸出版到第一年头上时,通讯员数量达到300多名,但初期通讯网络建设并非依靠党组织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普遍化的行为,而是记者以报社名义个别开展工作,因此分布不匀,许多边缘县乡通讯员很少,当地情况反映不上来且许多通讯员只挂名不写稿,整体通联工作效果不理想。(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22)1941年1月,全边区共有50多个通讯员,但报社全月只收到通讯员来稿37件。(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83)即使到一年半之后的1942年秋季本地新闻仍有2/3由专职记者采写,这种情况到1942年10月1日晋绥分局《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发表后才逐渐改观。(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22)

4. 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1942—1948年虽经抗战胜利、报纸更名,采编人员时有出入,如社长廖井丹赴东北办报、周文调重庆《新华日报》、1947年部分采编人员赴各地参加土改工作团后,由《晋绥大众报》抽调邵挺军等人补缺,以及部分人员从延安和晋绥边区其他部门零星调入,但人员规模并无大变化。1948年5月晋南解放,因抽调人员南下筹办《临汾人民报》,包括采通部主任兼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社长郁文、负责地方新闻的阮迪民、负责副刊的殷白、骨干记者邵挺军、吕梁分社社长富文、记者林夫和朗可(王充)等10余名新闻干部,《晋绥日报》出现严重人员缺口。(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47)为保证报纸正常出版,一批基层宣传干部和通讯员调入报

^①《为改版告读者》,《抗战日报》1942年5月19日。

社补缺。(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246)据苗振青回忆,先后调来的有兴县闫玉、岚县柴钟荣、崞县刘宗武、神池陈良柱、保德康溥泉以及苗振青本人共10余人。(康小明、康为民,2007:94)新闻采编人员既是文化人才又是技术干部,从人才培养角度讲,首先须具备一定知识基础,然后才有新闻采编业务的不断熟练。如此之短的时间内10多名晋西北本地干部密集进入报社采编岗位,这既有《抗战日报》多年来建立健全通讯网络、发现培养优秀通讯员的持续努力,更离不开中共在根据地建设中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对本地文化人才的培养。据康溥泉回忆,晋绥二中学校范若愚在北平上大学时就在《世界日报》做过记者,在二中时曾为学生讲授新闻学常识并经常为《抗战日报》撰写散文、杂文、通讯、论文,“在校长的耳濡目染之下,许多同学学会了写新闻,爱上了党的新闻工作……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得到了两个好老师,第一个老师是晋绥二中,它教导我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自己的终身交给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第二个老师是晋绥日报,它教给了我一种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具体知识和本领”。(康溥泉,2003)可以说,这是晋绥根据地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本地知识人才的成长之路。

在“第一个老师”普遍的正规的学校教育基础上,“第二个老师”的职业技能教育才有用武之地。《抗战日报》对通讯员的传帮带,主要包括不定期的新闻训练班和针对性的培养物色。报社新闻研究班经常举办,学员一般都是各县抽调来的宣传文化干部或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积极通讯员,马列主义新闻理论一般由报社组织学员自学,新闻常识由报社领导及有关科室负责人授课,关键是实习操作,主要学习修改和处理通讯员来稿,先由采通部通讯科具体指导,逐渐过渡到自己动手独立操作。学员能独立胜任稿件处理工作后,就被安排在通讯科工作,原通讯干部则抽调到采访或其他岗位,等下一批通讯员入职时上一批再依次递进。通过这种办法,《抗战日报》培养了不少新闻干部,1941年从决死二纵调到《抗战日报》的曾孚即是例子。曾虽是只有小学文化的部队通讯员,但

有办报经历且热爱写作,培训期间成绩优异,几百个速记符号掌握无误,培训3个月后直接留用,由扛枪兼写作的“二杆子”变成专业“笔杆子”。(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131、169—170)

另一个办法是从通讯干事中物色。通讯干事不仅是各地通讯网络的骨干,且新闻业务较一般通讯员熟练,《抗战日报》对这些骨干的培养十分重视。稿件无论采用与否都要求通讯科以信函方式回复,采用的说明原因并指出不足,不采用的要指明缺点和注意事项。记者下去采访,和通讯干事一起活动、一起写稿,当面帮助指导。当这些通讯干事成长起来后,报社有计划地从中物色人选充实采编队伍。(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68)可以说,对《抗战日报》新闻队伍而言,各地通讯干事和优秀通讯员是一个后备人才库。1948年一次性从各县调来10多名通讯干事足以说明,以根据地教育事业为支撑,经过报社多年经营,覆盖全区的通讯网络不但具备强大的信息供应能力且为报社储备了数量可观的后备人才。

三、全党办报:《抗战日报》通讯网络的构建

(一)融入中共组织

从今天的视角观之,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可以说缺乏技术含量——粗糙的马兰纸、劣质的油墨、落后的印刷设备、“傻大黑粗”的面孔、扫盲级别的文字技巧、下里巴人的村言野语,然后人背马驮送到深山沟里那些有时种地有时扛枪且长满老茧的手中,最后还得念出来才能被理解。这些文盲遍布的穷乡僻壤,理论上讲不具备媒体生存的基本条件,既缺少作者又缺乏读者且原本亦无信息需求。但中共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政权不可思议地“创造”了作者、“创造”了读者,同时“创造”了普通民众对报纸的需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一大奇迹。奇迹背后的

秘密是中共的群众路线,及在这条伸向社会底层的道路上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所表现出的决心、勇气和执行力。正是凭着这些,中共成功地在文化薄弱、技术落后的根据地编织起一张“人力密集型”通讯网络,这个网络既是边区社会的感知神经和传导神经又是社会的效应器官,在中枢和末梢之间发挥刺激、反射、协调、整合作用。正因其不是一般意义上独立的且在某种程度上又处于孤立状态的新闻传播活动,而是作为有机体的一个功能器官深刻地内化于党的组织机体,其社会功能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活动范畴。换言之,渗透社会底层、融入民众之中,对《抗战日报》及中共其他根据地创办的报纸而言,群众路线是其真正的技术含量。

1. 党报姓党: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虽然文化教育的各门类各有其重要性,但报纸这一内容更通俗化、形式更大众性、接受更少障碍、传播更广泛的意识形态传输载体显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全国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委的指示》,要求在秘密工作状态已结束的新条件下必须纠正过去观念,在公开状态下应重视报纸、阅读报纸、研究报纸,并要求各地“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新华日报》,以达到加强报纸与群众的联系,如帮助建立通讯工作,帮助建立读者会”。(穆欣,1992:9)1941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不仅对干部培养和通讯工作提出要求,而且对各根据地哪些报纸必须办(如机关报和通俗报)、哪些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均作出具体指示,同时建议通过党校教育培养新闻人才。^①1942年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进一步明确这是党的中心工作之一。^②显然,对中共党的工作而言,报纸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新闻产品,亦非简单意义上附着于主体工作的宣传教育工具,正如《抗

^①《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共产党人》,1941年8月。

^②《怎样办党报》,《抗战日报》1942年4月7日。

战日报》1944年一篇社论所言:报纸的功能不单是广而告之的宣传,是“深入的组织工作”。^①言外之意,报纸不是整个系统的“外挂”或“附件”,而是作为这一系统的核心程序有机地内化于各项工作。党报则通过这样的有机内化,以党的代言人身份获得言论权威的优势地位,在中共执政地区这种权威既是排他的又是垄断的,党报因此站在独一无二的高度成为引导舆论的意见领袖。

根据地时期中共报纸并不限于对外宣传动员,特殊情况下又是党内工作文件——不带红头和编号的文件。晋西事变之前的《五日时事》作为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机关报就是区党委和基层组织联络的渠道,一些党内可以公开的指示经常通过报纸传达,党报文章及其权威性类同于上级组织文件。实际上,虽然《五日时事》只是一张八开四版、五日一刊的小报,但编辑出版流程的严格程度不亚于党委文件,当时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稼夫不但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评,且每次审阅全部稿件。《抗战日报》创刊时晋西北虽由国共并存变为中共主导,但仍处日伪包围之中,由于持续不断的“扫荡”,根据地边界时伸时缩、面积时大时小,最严峻时有效控制范围仅限于腹心地区数县,在边缘地区因敌我错处的复杂环境,许多党组织和政府机构驻地秘密且行踪无定、沟通不便。在此情况下,报纸经常就是上级文件。《抗战日报》社在每个专区都派有常驻记者,由于其都在各地独立活动,很难随时与报社联系,所到之处在政治上、组织上须受所在地党委领导。同时,因报社采通部与新华社晋绥分社是一套人马,各专区外派记者都配有收发新闻电讯电台、手摇发电机、收发报员和译电员,既拍发当地新闻也抄收延安新华社电讯稿并负责将重要新闻抄送地区党委,以便党委了解中央工作部署等重要信息。(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70、161—163)由此可见,《抗战日报》外派记者既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宣传干部又是各地党委的工作助手。

事实证明,在这些对敌斗争复杂的地区,即使以党报这样相对便捷

^①《如何使我们的报纸更加与群众相结合》,《抗战日报》1944年5月20日。

的形式作为上情下达、下情上知的渠道亦面临重重困难。因此,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报社制定外出采访的“非常”流程:记者到基层采访属于组织行为,须通过报社地委县委层层转交组织关系,然后基层党组织派人陪同,不经此程序新闻记者不可能在敌占区或游击区找到处于秘密状态的党组织和地方政权,即便找到亦不可能接受被采访;对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组织派来的陪同人员只作口头介绍不留文字,同时为防意外发生导致组织机密外泄,记者采访不做记录,写成稿件后底稿烧毁而不留痕迹。(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75)在此条件下,记者工作与地下工作别无二致,且新闻工作者与地下工作者一样随时面临危险。如1940年记者汪涛赴八分区清太徐县采访,穿越铁路进入敌占区后与专署其他人员失散,后在当地群众掩护下才与区村干部取得联系并脱险。(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131)采访人员之外,负责送报的交通员与敌遭遇后为保护报纸开枪战斗的事件时有发生,离石交通员李人和甚至壮烈牺牲。(山西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等,1997:228)可以说,在上述地区报社记者和交通员所采集和传送的并非常规意义上的新闻,而是开展党的工作所需要的公开情报。虽然抗战期间中共合法地位得到国民政府承认,其组织工作由秘密状态变为公开,并适应新的条件建立了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党报党刊系统、承担起比秘密时期更大的宣传功能,但在敌后根据地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中共组织在许多地方并非完全公开,秘密时期报纸的职能仍保持,既是宣传工具又是组织手段。这一职责虽较一般意义上的宣传功能显得狭窄,但对党组织的工作需求而言无疑更具刚性,故只能通过高度有机化的媒体即党的机关报才能实现。

2.“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尽管特殊情况在局部地区存在,但《抗战日报》在中共独立主导的晋西北毕竟是一张公开报纸。除前述狭窄却刚性的功能外,更多时候主要是作为党组织代言人面向社会发声,然这个功能并非自动实现。该报虽

一方面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作为一项经常性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坚持用党的方针政策来指导报纸编辑工作,但在创办之初对根据地的融入程度和有机化水平并非尽善——内容上存在脱离根据地实际情况、形式上存在超越根据地读者接受水平的问题,地方新闻量少质劣,大量新闻版面用来刊登新华社国内国际稿件,即毛泽东批评的“为新华社办报”而非“为晋绥人民办报”。(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13)同时,社论几乎天天有却多空发议论,与地方工作无关。究其原因,一是人手不敷使用,创刊初连每个区派驻一个常驻记者都做不到;二是因惯性作用,编辑记者因袭城市办报思路,农村办报经验尚在探索阶段;三是通讯工作尚未发展起来,无法充分发掘新闻资源。三个原因互有关联,如因人手不足而腾不出力量发展通讯队伍,因袭故法而未足够重视通讯网络建设并形成群众办报理念,然脱离根据地实际而“为新华社办报”归根到底是因通讯网络无力、地方稿源不足。通讯网络问题则因初期只靠记者在采访中发展通讯员,不但量少且分布不均,许多地方和部门无通讯员,许多通讯员只挂名不写稿。实际上,农村办报不同于城市,开门办报不同于同仁办报,表现在晋西北,作者队伍是一个大问题。

虽然存在种种缺点,但绝不意味着初期的《抗战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是不成功的。事实上,无论军事斗争方面的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报道、政权建设方面对村选和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纠“左”报道,还是文化建设方面对国民教育正规化、开展冬学、普及卫生工作的宣传,《抗战日报》都可圈可点。即便如此,毛泽东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中所称赞的生动局面远未出现,经常性存在的依然是该报编辑部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通过自查所认识到的“聋盲哑软”四种病症,即对群众呼声和要求失聪、对各种问题失明、解释党的政策失声、批判和斗争无力。(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17)可见,《抗战日报》作为中共晋绥分局机关报或党组织代言人,与晋西北民众依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疏离感。

3. 一纸《决定》：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党报有机化的实现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报纸须以党性为指导而融入党的工作,另一方面党的各级组织须以报纸为坚强自身的重要阵地、动员宣传的重要手段、各项工作展开的重要方式,并举全党之力办报。这两个方面互为前提,但从党报对党的依附性而言后者显然是前者的基础。作为党的机关报,其最基本的职责正如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所言,就是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关键并不在于报纸说什么,而是这种言说对听到的人有什么作用,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上升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则问题。为此,必须建立相应的渠道和机制,以汲取过滤来自民间社会的声音和意见,并对其进行基于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加工和技术处理,在对这些意见传播中使党的声音成为舆论的“领唱者”甚至成为舆论本身。因此,它不仅是一个党发表意见的过程,亦不仅是一个党与民众交换意见的过程,而是一个以党为中心统一意见的过程。

中宣部1942年3月通知提出,报纸反映生活(包括党的生活与群众的生活)是一个党性问题,并要求党政军民负责人成为报纸作者,报社要与党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①10月,成立伊始的中共晋绥分局作出《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称《抗战日报》是“体现党和政府一切政策的有力工具”、“对敌斗争的锋利武器”,亦是“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喉舌”“反映人民生活 and 要求的镜子”。《决定》将“忽视或轻视”报纸、不懂得利用报纸指导工作,“没有为它写文章,写消息,写通讯”,没有向不识字干部群众读报的问题,上升到党性高度,提出严厉批评并要求迅速纠正。为办好报纸、用好报纸、发挥报纸的宣传鼓动效能和指导工作的作用,以教育干部和组织群众,晋绥分局要求:(1)从分局到各级党委党团,要把办报作为重要业务定期讨论,讨论情况要定期报

^① 《怎样办党报》,《抗战日报》1942年4月7日。

告分局,分局宣传部要将其作为工作检查之一。(2)各地委县委宣传部长、军区宣传部长、军分区和旅宣传科长、团宣传股长须担任抗战日报特约通讯员,与报社直接联系。特约通讯员职责包括以下五项:第一,负责组织所管辖地区和部队内通讯员,吸收具有写消息能力的干部担任通讯员并具体帮助和领导通讯员如何收集材料写作稿件;第二,负责发动通讯员及有抗战日报的机构或个人进行组织读报组工作,使每份报纸常有一百人读到或听到,并反映报纸在干部和群众中的影响和意见及对报纸各个时期号召的响应;第三,负责供应抗战日报各种新闻材料或文章,并组织同级党政军民学负责人及党外人士替抗战日报写文章;第四,负责切实帮助抗战日报各地办事处、分销处,检查报纸赠送和发行情况并帮助其改善健全,不得有停滞、缓慢、浪费等现象;第五,负责帮助抗战日报派驻的记者了解情况并供给必要材料,使其采访工作便利,必要时帮助解决工作上的其他困难。(3)各单位负责人有为报纸写稿的义务并对通讯工作负有责任,同时要对通讯员投稿审阅签字并及时寄送。(4)凡党员中经聘定或指定的抗战日报特约撰稿员均须遵守既定规约按期写稿。(5)凡抗战日报派人前往各地购买印刷材料者各级党委党团应切实负责帮助,如该社委托代购应负责完成任务。(中共中央晋绥分局,1942)晋绥分局一纸《决定》为《抗战日报》发展了大批特约通讯员,从文件规定上看,各地委县委和军区宣传部长、军分区、旅、团一级宣传科、股长以及部分经县委宣传部推荐的区干部均在其中,不但数量上远远超过报社采编人员,而且对各地各项工作的熟悉程度远非专业记者可比。

根据《决定》,全边区凡带“长”的人都负有为《抗战日报》发展通讯员、建立读报组、协助采访和发行、提供线索和稿源的具体责任。可以说,为实现人人办报、人人看报,以特约通讯员为枢纽,晋绥边区党政军民学被自上而下地动员起来并参与其中。尤其广泛建立的读报组更使发行万余份的《抗战日报》受众群体成百倍放大,在人口仅有二三百万的晋绥边区受众占比超过同期所有城市报纸。或者说,《决定》使整个边区

成为一个大报社,各级各类机关负责人成为报社编外工作人员,“全党办报”目标得以实现。

4. 晋绥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下发后,《抗战日报》依托中共晋绥分局组织架构迅速融入遍布晋西北的中共党的组织网络,通过这个网络来自基层的报道不断增多,生动活泼的办报局面由此打开。这种局面,从抗战胜利到1947年初全面土改之前该报对边区开展的反奸清算运动报道中可见一斑。

抗战胜利后,中共在解放区广泛开展群众性反奸清算运动。1945年10月,晋绥分局指示老解放区群众运动的任务是减租查租与反对特务破坏分子,新解放区则是反汉奸、贪污讹诈、摊派不公以及清理敌伪时期一切纠纷。次年5月,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发出后,晋绥分局要求群众尚未发动地区务必于1946年底前全部或大部完成,当年6月召开的分局高干会议通过张稼夫所作开展群众运动解决土地问题的报告,贺龙在总结报告中强调新区要根据“五四”指示继续进行土改,同时坚决制止侵犯中农利益。(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1989:293、317、321)期间,反奸清算、减租查租、土地回赎始终是《抗战日报》的报道重点并随时间推移不断升温。以同年8月为例,该报共发此类报道51篇,若加上开明绅士和部分地主无偿献地及在清算果实分配时优待抗烈属报道则总数近百条,日均3条。在51篇稿件中,一版稿件19篇,占比近40%,其中一版头条11篇,占比超过20%。上述稿件中,讯头为“本报特讯”的文章按通例应为晋绥分局直接供稿,故不计入记者或通讯员名下。除此之外的50篇稿件中,记者、编辑纪希晨、韩生本(生、本、生本皆系韩生本)、曾孚(孚)、刘祖武、黄照、成刀戈、刘焕文等独立采写者,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发自晋绥各地者,评论文章未署名者,计21篇。若记者与通讯员合署名的5篇均按半数计,则报社自采稿件23.5篇,占比不足半数。特约通讯员

与通讯员参与署名的稿件 29 篇,其中独立提供的 24 篇,如与记者合署名的 5 篇按半数计,则特约通讯员与通讯员来稿共 26.5 篇,占比超过半数。通讯员中凭职务可确定为特约通讯员者有:晋绥五地委专员屈健、交城县委宣传部长李立功、静乐县长李春芳、静乐县委书记王敖、六分区抗联主任张承武、晋绥人民剧社政治指导员胡宗武、中阳县委负责人阎明、忻县县长刘杰、方山县委书记胡克实、临县县委书记秦克昌、宁武县委宣传部长周恭以及石敬野和李六平(前者 1940 年任新军长城剧社艺术指挥、后者 1945 年在贺龙中学负责学生工作,两人 1946 年职务不详)。上述 13 人皆为各分区各县及边区其他机关单位负责人,职务最高者地委专员,最低者县委常委,其参与署名稿件超过 20%。13 人中除胡宗武、石敬野、李六平、张承武来自文化艺术单位和人民团体,其余 9 人均均为地县级党政领导。^① 据 1942 年统计,《抗战日报》特约通讯员共 291 人,其中每月来稿一篇及以上者 48 人,直到 1948 年特约通讯员中常写稿者仍有三四十人之多。(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95)

总之,1946 年 8 月一个月时间内,该报就反奸清算减租回赎专题组织了 51 篇报道,这些报道来自边区各地,可以说全景式地展现了晋绥边区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的变化,同时折射出中共由减租减息向全面土改过渡的土地政策对解放区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在此次长达一年多的战役性报道中,以其大规模、高密度、全覆盖的新闻宣传,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发挥了出色的动员作用。而近 40% 被一版刊发、超过 20% 被用作头版头条的比例,一方面表明晋绥分局和该报社对此次战役性报道的高度重视,同时足以证明稿件整体质量之高。而量大质高的保证则是稿源渠道的多样化,除报社和新华总分社采访力量外,各地通讯员、特约通讯员负担了半数以上报道任务,而通过全党办报动员起来的、以党政军民学领导为主体的特约通讯员群体无疑是此次战役性报道中的最大亮点——他们不但负责组建了覆盖全区的通讯网

^① 详见《晋绥日报》1946 年 8 月相关报道。

络,而且以他们的基层实际工作为报纸提供了鲜活的新闻素材,甚至直接动笔写稿,承担了其中 1/5 的报道任务。可以说,没有全党办报的格局,没有这一群体的有力担当,《抗战日报》很难在 1944 年之后出现如此生动活泼的局面。

(二) 嵌入基层社会

庞大而健全的通讯网络是《抗战日报》融入当地社会、落实办报宗旨、实现办报目的的主要依靠。报社首任社长廖井丹曾指出根据地办报须解决四个问题:一是正确的编辑方针,即在党的总任务下为当地人民服务;二是要有一个全区的群众性通讯网;三是建立和培养编辑队伍;四是适应战时环境的后勤服务系统。关于通讯网络,他认为采编队伍的重要性在于更好地为通讯员服务,确保在落后条件下新闻可以从群众中来,故通讯网建设是关键之关键。(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12—34)纵观《抗战日报》1940—1949 年办报史,通讯网络建立健全和通讯员发展培养始终是报社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小编辑部大通讯网”的开放性理念贯穿始终,“以通讯网为根、以编辑部为干”的群众办报格局随着报纸的发展日益显著,鼎盛时期通讯员数量数十倍于专业采编人员,在边区 20 多县数以千计的通讯员队伍支撑着编辑 10 多人、记者三四十人的《抗战日报》,使之成为报纸汲取新闻资源的强大根系和融入当地社会的便捷管道,并因之成为中共在根据地进行宣传动员、社会治理的可靠手段。

1. 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建立覆盖整个根据地且高效运转的通讯网络仅靠报社自身努力无法完成。初期的《抗战日报》是依靠记者外出采访时发展通讯员,故量少且分布不均、腹心地区多而边缘县份少,同时许多通讯员挂名不写稿,当

地情况反映不到报面上来,主要还是靠报社派出的专职记者供稿。直到1942年报社将“情况上报,得到晋绥分局的大力支持”,局面才开始扭转。(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20—22)

事实上,就党报通讯网的建立和中共对此项工作的支持而言,“自上而下”的起点并非晋绥分局而是中共中央。继1942年3月中宣部通知之后,4月2日新华社播发题为“怎样办党报”的宣传指南小册子,7日《抗战日报》二、三两版全文转载这条新华社电文。中宣部《通知》(即1942年3月发布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只有反映党的工作、群众生活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为别人的通讯社当义务宣传员是党性不强的表现,“要有与党的生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联系的通讯员与特约撰稿员”。^①10月,晋绥分局作出《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对各级各地提出硬性要求,通讯网无力的问题才解决。到1944年5月20日《抗战日报》社论仍指出:必须有充分实际工作经验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同志全体动员起来参加报纸工作,只有大家动手,给报纸写稿,组织通讯,使农村工厂部队学校机关参加各种实际工作的同志写新闻通讯论文,不断地寄给报纸,热切地关心报纸,才能做到利用报纸组织教育群众并达到改进工作的目的。但目前“我们的报纸还有很大缺点,和实际工作比较起来是远远落后了的”,强调“利用报纸的读者网和通讯网来组织教育群众,也和我们利用民兵和生产来组织教育群众一样具有同等的意义”,要求“对于写稿还欠缺端正态度的同志,应当更深入实际,和群众结合,不是把自己而是把群众的生活、要求和情绪去表现出来”。^②12月20日,毛泽东对《抗战日报》做出指示,要求本地新闻“至少占两版,多到三版”,版序应“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强调“当地人民的需要”和“地方性的指导意义”。(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13—14)落实这个指示,意味着报社不但要在思想上对本地新闻给予特别重视,且

^① 《怎样办党报》,《抗战日报》1942年4月7日。

^② 《如何使我们的报纸更加与群众结合》,《抗战日报》1944年5月20日。

需更多通讯员和更为健全高效的通讯网络,以解决“至少占两版”“多到三版”的本地新闻的稿源问题。1945年11月21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给《抗战日报》社长周文的信中又提出“以为通讯员服务为第一”、反对报人第一,要求“动员全党干部来写稿,来提意见,稿子要给他改,给他登,意见要接受或答复,要求要满足,而且把满足他们的要求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即使将来到了大城市,根据地报纸的有些做法还将作为我们报纸的特点保存下来,“如广大的通讯网”。1946年2月,晋绥分局转发西北局1月20日《关于加强各县通讯工作的通知》,强调在县委宣传部设立通讯干事的重要性。5月25日,晋绥分局指示各地:广泛的群众性的通讯网是全党办报的中心环节,通讯网开展的关键在于各级党委的重视与领导的负责,并决定将党报通讯与发行工作的好坏作为检查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工作的标准。11月8日,晋绥分局再发指示,要求贯彻5·25指示并提出通讯干事业务专门化。12月10日,晋绥日报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召开兴、岚、河、保、临、静、阳7县通讯干事会议,交流通讯工作经验。(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56—58)1942—1946年间,办报作为中共中心工作、通讯网作为全党办报核心环节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晋绥分局自上而下的重视并提升到党性的高度,而《抗战日报》因楼台近水更受到毛主席和中宣部的高度关注。晋绥各地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化政策压力为工作动力自是必然。但就政策落实和任务完成而言,动力虽重要却毕竟只是开头。在民众十之八九为文盲半文盲、干部半数以上是“大老粗”的根据地,在每天都有战事发生、每天都在流血牺牲及居不安食不饱的社会环境中,通讯队伍的建设、全党办报的实现远比下一个决心要艰难。

2. 通讯队伍的组织

晋绥分局《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下发后,摆在各县党委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组织队伍,而要完成此项任务首先面对的是对文化工作的轻

视态度和畏难情绪——战乱时期重武轻文、文盲半文盲对文字的敬畏及因内心敬畏而产生的口头上的不屑。这种轻视不但存于一般民众心里,甚至专门从事宣传工作的干部有时也难免。1946年2月4日《抗战日报》刊登的保德县委通讯干事康溥泉的文章《我对文化工作的反省》称:1945年10月调任通讯干事后“虽然想做好工作,但思想上又产生了许多糊涂观念”,认为自己工作“任务轻没事干”且老解放区无新鲜事情可写,想和其他同志一样到新区工作;读读《抗战日报》的文章“没有什么深切的感觉,或觉得没甚意思”。后来到基层看到“群众是如何迫切要求文化食粮”及报纸上的一首《查租歌》是如何教育了群众和地主,并使群众顺利从地主手中赎回77垧土地的事例,“从这村中才具体看到了文化工作帮助群众斗争的威力,而我以前轻视文化工作的想法是根本不懂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宣传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线,每一篇文章都是一颗地雷”。从此才放弃调动工作想法,“下决心使自己的思想情绪完全和群众融合起来,无条件安心地为革命工作”。编辑在此文“编者按”中认为这篇反省“很好很重要”,因“有许多认识上思想上的问题,正需要大家来检讨、研究,和共同勉励”,从而使文化工作“能够担负起已经到来而更将开展的新形势所给予的新任务”。(康溥泉,1946)文化水平低不会写、工作繁忙不能写、做了工作就行不必写,面对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仅靠号召是不可能组织起一支覆盖全区的广泛的通讯队伍的。为此,晋绥边区各地采取抓干部、抓结合、抓制度的办法。

首先是抓干部。在组织起来的层级分明的群体中,下级不但要执行上级决定,且上级官员言行和态度对其而言相当于无声的命令。为贯彻晋绥分局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各地领导干部均视此项工作为领导工作的重要部分,不但以身作则带头写稿且“开会就讲,下乡就抓,布置检查工作时一并布置检查通讯工作”,从而形成重视通讯工作的氛围。三分区专门成立通讯科,分区领导从1943年起定期到各县检查通讯工作。静宁县领导班子中谁分到哪个区抓中心工作就负责哪个区通讯工

作,不但审阅稿件且亲自向报社投递。临县县委召开的通讯工作讨论会议上要求每个县委委员检讨自己过去不写稿少写稿的情况,重新制定写稿计划并分工负责各区通讯工作,组织通讯员写稿。1948年临县县委在整党工作会议期间四次讨论通讯工作,同时组织与会干部开展报道活动,半月会期内107人写稿141篇。在许多地区,区干部被要求直接组织并负责通讯小组,分工什么就负责什么领域通讯任务,在哪个村工作就和当地村干部、积极分子一起组成通讯小组。如此层层传导压力,使晋绥边区通讯网不但广泛建立且呈现出严密的组织性。八分区通讯小组从各单位各部门一直深入到各区各村乃至模范变工队,小组长全部由政治可靠、认真负责的干部担任;军区六分区在各个连队普遍建立通讯小组。(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85—86)通过党政军民学机关层层传导并与相关单位对口建立,最终将分局决定一贯到底,落实到边区每一根末梢神经——农村各个村庄、军队各个连队、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各系统的地方分支。

其次是抓结合。一是做与写结合,发展实际工作者参与通讯工作。1944年,二分区在开展通讯工作过程中提出“工作者就是写作者”(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87),《抗战日报》同年9月提出“做什么写什么”方针并号召通讯员围绕中心工作开展通讯报道,通过通讯报道推动中心工作,根据地地做什么、群众在做什么就写什么,自己做什么就写什么。^①之后,各地鼓励通讯员将工作写成新闻通讯,以此为前提,发展通讯员的主要条件不是文化程度而是是否接近各种工作,如岚县有大量村干部、劳动英雄、民兵积极分子成为报社通讯员,这拓宽了发展通讯员队伍的路子,许多工农群众甚至不识字的人被吸收为通讯员,包括家喻户晓的张初元、温象栓、白改玉等,其中有些稿件甚至还上了报纸头版头条。神府县1944年2月召开通讯员会议,80余名与会者中有3/4是工农通讯员,其中一字不识的劳动模范刘德如参加了通讯组,他自称是“跑腿通讯

^①《改出日刊与加强通讯工作》,《抗战日报》1944年9月18日。

员”,一有消息就到区上口头反映。(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85—86)二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优势互补。工农通讯员发展起来后,由于其大都是文盲半文盲,只能口头报告,写稿确实困难,为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地在成立通讯小组时把他们和知识分子干部混合编组,前者出内容后者出文字,合作写成新闻稿件。在广大农村,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普遍形式是小学教师与村干部合作,1942年保德县教育科将全县小学教师组织起来以区为单位普遍建立通讯组,这种合作方式不但促进了知识分子成长进步且许多工农干部在知识分子帮助下由不识字到识字、由不会写到会写,基层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由此相应提升。(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86、103)三是工作、写稿与学习结合,这是通讯员处理工作、学习、写稿三者关系,提倡“学了文件做工作,做了工作写报道”,把工作和写稿结合起来。同时,通讯组就是学习组,为写好报道要求通讯员在工作之余加强文化学习,通过学习推动实际工作,临南五区区长闫钊说,为写好稿子,他必须下去收集材料,材料收集帮助他指导了全区工作,工作干好了更有兴趣学习,更有能力写稿。(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102)在农村,许多通讯小组与变工组、识字组、读报组本身是统一的,生产、学习、写稿结合得更密切,报纸是读报组的工作武器,同时是识字组的现成教材,变工互助的实际工作同时又是写稿的素材,许多变工组在安排生产时就会一并布置写稿和识字任务。因此,人人都学会写新闻不但有利于办好报纸,“对于我们的全部工作乃至每个工作人员的工作品质,一定都有极大好处”。(胡乔木,1946)

第三是抓制度。通讯组织建立起来后,晋绥边区各地普遍制定工作制度,包括登记、审稿、总结报告制度。对通讯员来稿及稿件使用和处理情况逐日登记;县委负责人要对通讯员稿件进行审阅,决定寄送报社者要签字盖章,决定退回作者须说明原因;每月通讯报道情况要以书面报告形式送交报社,《抗战日报》每月在《通讯研究》杂志上公布各县情况。(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87、97)同时,通讯小组内部亦有写稿、审

稿、学习、会议等各项制度,对通讯员均有具体的要求和规定。如保德县政府通讯小组成立时徐县长亲自参加,指定8人为通讯员并推选出正副组长,该通讯组制度包括:每月开会一次,每人每月写稿一篇,稿件需经组长签字,重要稿件集体写作等。^①雁北地委规定每县配备2—3名通讯干事,通讯干事工作调动非经地委宣传部批准各县不得擅自调整,基干通讯员调动,通讯员身份要以组织关系形式介绍到新单位。通过这些制度,从报社到各县、从通讯干事到通讯小组、通讯员,组织成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通讯信息网络。为严格执行这些制度,各地还出台相应的纪律措施和奖惩制度。如宁武二区规定通讯员完不成写稿计划者第一次小组提示,第二次批评,第三次取消资格。岚县二区规定年度总结时写稿最多的前三名每人奖励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所需费用由最后三名出资。神池县规定模范通讯员条件包括写稿积极、量大质优、领导通讯工作出色,三个月内培养3名工农通讯员,学习认真,组织写稿突出。(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86、88)

对于上述各项措施,边区一级机关首先带头执行。1942年12月6日,晋绥分局宣传部召集机关中适合担任通讯员的人员成立《抗战日报》晋绥分局通讯组,并提出“为报纸当通讯员是共产党员的义务,不是额外负担”。^②次日,边区行署专门召开会议成立通讯小组,包括2名特约通讯员和8名通讯员,大家检讨过去写稿少的问题,决定每人每月写稿3篇,“且做到行署所有新闻,保证不会遗漏”,“遇有外出同志及工作团下乡,通讯小组也要负责请人担任通讯工作”。^③之后,各地各部门通讯组织相继建立起来。以二专区为例,晋绥分局《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下发当年,专署、抗联、二中、贸易总局办事处统一于11月28日成立各自的通讯小组,专署武装部要求“各县武装部确定一人向报纸投稿,并规

① 《临县整顿通讯工作,保德岚县建立通讯小组》,《抗战日报》1943年1月1日。

② 《分局抗联通讯小组成立》,《抗战日报》1942年12月19日。

③ 《行署通讯小组商讨今后通讯工作》,《抗战日报》1942年12月12日。

定每人每月至少写稿一篇,反映民兵活动情形”,专署通讯小组要求分布在各科的通讯员不但要“抓紧本科材料写稿,研究报纸”,且要“推动能写稿的同志写稿”。与此同时,各县各区通讯组织相继成立并投入工作,其中岢岚一县就成立9个通讯小组“并规定每一月半每人写消息两则”。^①通讯工作开展过程中,各项制度逐渐完善,如二专署通讯小组在检查工作时发现不少通讯员写稿后没有交机关负责人审阅,发生多次重稿或写了没有寄送问题,因此专门强调稿件审阅签字制度。农村之外,部队亦组织通讯队伍。如八分区部队在司令部成立通讯小组的基础上每个支队又发展3—4人另设小组,在内部建立自上而下覆盖全分区各部队的通讯网络,同时“与地方通讯小组密切联系、适当分工,决不遗漏一点有价值的新闻材料”。^②厂矿亦不例外,晋西总工会指示各工厂工会加强墙报工作并“设法奖励帮助热心写作的同志,供给墙报稿件,并分别介绍给大众报、抗战日报刊登”。^③各地墙报组织实际上等同于《抗战日报》的通讯组织。

通讯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按照与党组织对口建立、归口管理原则,晋绥边区健全了以报社(通讯科)、分区(通讯干事,有的分区设通讯科)、县委(专职通讯干事)、各区及机关、团体、工厂(通讯小组,个别村亦设通讯小组)为基本架构的通讯队伍组织体系,将特约通讯员、基干通讯员、通讯员、工农通讯员纳入其中,形成一个既有纵的领导又有横向联系的高度组织化的通讯网络;其中报社通讯科是中枢,通讯科内部实行地区专管、分区包干,每个地区分管人员负责处理管辖地区通讯员来稿,按月对各县通讯情况做出小结,与各县委及通讯干事进行联系,并对各县通讯工作报告和来信回复,但有关吸收通讯员、建立通讯小组、组织报道、处理来稿等各项事宜一律通过各县归口管理,各地通讯队伍严格置

①《二专区本报通讯员相继研讨通讯工作,保德教员组织读报小组》,《抗战日报》1943年1月5日。

②《八分区部队通讯小组成立》,《抗战日报》1943年1月16日。

③《提倡工友写文章,晋西总工会发出指示》,《抗战日报》1943年1月1日。

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报社不越过各地党委直接指挥通讯小组和通讯员。(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96)即便在土改中通讯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地方甚至陷于瘫痪时期,改造、整顿、新建通讯小组的工作亦是依靠各地土改工作团来具体落实。

通讯干事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组织上受地县党委领导,业务上接受报社通讯科指导,负责领导各地通讯报道,组建通讯小组,向通讯小组传达报道提纲,推动和帮助通讯员写稿,同时负责来稿收发、登记、编辑、送审,每月向地委宣传部和报社书面报告通讯报道情况,并就当地重大活动采写新闻报道。因此,各县通讯工作能否搞好与通讯干事关系密切。通讯小组是通讯工作基层组织,有正副组长和完善的管理制度。通讯小组由基干通讯员、通讯员和工农通讯员组成,其中基干通讯员通常是县区领导干部,除自己写稿外一般还兼通讯小组长,“从全边区看,通讯队伍是伴随着基干通讯员的增强而发展壮大的。1946年9月时的1210个通讯员中就有基干通讯员192人,接近占16%”。通讯员是通讯队伍主体,成员以区村基层干部和农村小学教师为主,分布面广、来稿量大。工农通讯员约占1/3,文化水平低,有的是口头报告情况的“跑腿通讯员”,但最贴近基层实际工作,可以为报纸提供丰富的简讯内容,各地一般将之与小学教师、区村干部混编组,以集体写稿方式发挥其作用。(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92—94)

3. 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通讯工作的开展需要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各县中处于腹心地区的兴、保、临等县因中共政权控制力较强,通讯工作开展较顺,而边缘各县则属于敌我拉锯的游击区,通讯网络运行相对艰难,如六分区静宁县。从静乐、宁武向东翻过云中山即是忻崞平川接敌区,云中山东麓蒲阁寨是晋绥边区重要门户,1942年日军在此设立据点,以控制忻县、崞县、静乐、宁武4县交通,加强对晋绥和陕甘宁边区封锁。抗

日武装对蒲阁寨据点的围困从1943年10月到1944年4月持续半年之久,成为晋绥抗战中的著名战例。(穆欣,1961:31—56)静宁这个县名带有典型的接敌区特征,在此类地区抗日政权的活动一般限于两县交界地带,类似这样的“边县”还有五分区大(同)怀(仁)左(云)、左(云)右(玉)凉(城)、八分区清(徐)太(原)徐(沟)等。在这些地区,通讯网建立、通讯队伍发展必受战争影响,虽然晋绥分局1942年下达指示后静宁县建立了通讯组织,但通讯工作直到1944年4月才走上正轨,这个时间正好与蒲阁寨围困战胜利时间吻合。据县委书记冯凯1945年发表于《抗战日报》的文章载,是年1—3月份该县“只有县上两三个同志动笔,区、村根本无人写稿,通讯小组与通讯员都是有名无实,完全处在自然状态之中”。(冯凯,1945)但经近一年努力,静宁县将一批“大老粗”基层干部改造成积极写稿的笔杆子,来稿数量稳定在每年400篇以上,成为晋绥边区通讯工作开展最好的县份之一。^①其改造方法可归结为两个字:一个是“逼”,一个是“哄”。

第一,用政策逼、用人情逼,先把鸭子赶上架。县委决定对通讯组织整顿后首先对全县通讯队伍诊断把脉,通过县级领导干部讨论和对通讯队伍思想检查发现主要问题是普遍存在“不愿写”(认为只有文化人、记者才能写稿)、“不敢写”(怕登不出来)和“何必写”(做工作就算了,何必出风头),于是专门召开通讯工作会议向所有通讯员强调:给报纸写稿不是出风头而是对革命负责,应与每个人本身工作及当前中心工作配合起来,把通讯工作作为推动与检查一切工作的尺度。同时要求通讯员具体检讨并布置今后通讯工作,过去写稿好的、写得不好的和一贯不写的都在会上交换意见,以提高大家写稿的勇气与能力。通讯会议后,县领导无论大小会一有机会就强调通讯工作,加强每个人的责任心。政策施压之外,还利用人际情面与通讯员打心理战,经常与通讯干部个别谈心且见面就谈,“有的同志没有写稿或没有注意写稿,一问到,他就觉得惭

^①《编者按》,《抗战日报》1945年1月18日。

愧,脸红起来”,通过这样的人情压力让原本不积极的通讯员不好意思不写稿。人动员起来后,静宁县委迅速指定各区负责人担任通讯小组长,并向各小组提出具体要求:每人每月至少一篇,同时要努力发展通讯员特别是工农通讯员,进一步扩大队伍。在政策和情面“软硬兼施”的压力下,通讯队伍动了起来,工作有了很大改观,由原来每月仅1篇增加到4月7篇、5月17篇、6月24篇。(冯凯,1945)

第二,后面推、前面引,哄着写。队伍动起来后步调不一致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静宁县委发现“通讯员头脑中存在着一些毛病”且妨碍通讯工作开展,这些问题有新出现的如支差心理,亦有老问题如没时间,还有老问题的新表现如几篇稿子没见报就失掉信心。对此,县委再次给通讯员上劲儿拧发条。首先还是背后督促,让每个通讯员写一篇关于通讯工作的反省,继续大小会议强调和个别谈话,强化“写稿也是革命工作”的认识。其次是加强正面引导,号召通讯员“做什么写什么”“怎么做怎么写”,只要“以自己做过的去写稿,那就到处是材料,不仅是知识分子,工农干部也应该并且可以写稿”。经过教育,通讯员思想有了进步。为巩固既有成果,县里又采取更具体的分工办法来落实“做什么写什么”的原则,“以每个通讯员的工作岗位和职务,分配其负责报道那方面的材料,比如谁负责围困某个据点,或负责领导某项生产工作,谁就负责报道该项工作,用这种工作与写稿结合的办法,克服‘额外负担’没有时间或没有材料等错误认识,真正厘清了写稿就是本身工作之一”。当年6月份静宁县投稿增至38篇,7月份达39篇,比较突出的王斌、张先两位通讯员7月份各写七八篇,且数量增加时稿件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冯凯,1945)

第三,经常逼、经常哄,压力和引导日常化。8月份投稿量下降,减少到23篇,县委发现问题苗头并立即分析原因采取措施。首先,在全县培养骨干通讯员,将其分布到各区担任通讯小组长。这些骨干到任后同样采取连逼带哄、前推后引办法,对一般通讯员进行指导与督促,“根据我们初步提供意见、修改,并在报上刊登过一两篇,他的写稿信心就提高

了,也感到了写稿中的兴趣,以后就可以慢慢培养他,以至变成中心骨干”。其次,混和编队、采写分工、集体写稿。意识到个别通讯员的写作困难短期内无法克服,为保护其积极性,静宁县开始推广集体写作办法,不会写的采访、会写的执笔,即“我们在两个区采用这个办法的结果,使不善于组织材料的同志写作情绪提高了”。通过这种办法确保写稿能力较差的通讯员不掉队并在工作中进步,最后许多工农通讯员如李芝清亦开始写稿。另外,静宁县还发明“集体领导、分区负责”办法,县里确定3个领导分片负责通讯工作,不但审稿、改稿、登记、编号、寄发、督促与帮助该组写稿,且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写稿,县领导关卡前移、亲临通讯一线,带着写、催着写、看着写,各地通讯小组时时感到上级率先垂范的重视及无处不在的注视,工作上自然不敢怠慢。上行下效,静宁四区通讯员当年12月30日举行会议决定在内容上要抓住中心工作、典型村和中心人物来写稿,在组织形式上“谁在哪地工作就负责报道哪地情形”,还制定目标并保证小组每月写稿20多篇。(冯凯,1945)

就基层干部尤其区村干部文化水准言之,整个晋绥边区像静宁县一样在人力资源上并不具备开展通讯工作的先天条件,但中共的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党员干部的服从精神及克服困难的决心勇气确保了其相关政策在基层有力有效执行,通过层层传导的政策压力和因地制宜的动员策略最终完成全党办报的基层发动,“创造”出一支由“大老粗”组成的“笔杆子”队伍,保证了通讯网络终端体系的高效运行。

四、结语

作为党的一种工作手段、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中共各级组织对其机关报的要求虽包含但绝不限于一个简单的信息共享平台,或一个干部动员和教育为目的的党内工作交流平台。在战时环境中,上述目的固然重要却非至关重要,而此类目的的达成尚有诸多代价更低的替代性手

段,如党内逐级传达的通知和文件及边区政府所办的《行政导报》等。在人财物力匮乏疲弱、生存面临巨大威胁的条件下,中共在根据地一边与日伪殊死搏斗,同时在战火燃烧的土地上千方百计地组织专业新闻队伍、动员基层办报力量,此种举全党之力而不计代价的行为显然有着更深用意。事实上,新闻信息作为一种“无形”却“最有力的意见”(胡乔木,1946),专业新闻机构和遍布域内的各级通讯组织、通讯员作为意见的采集者和新闻信息的生产者都服务于这样的目的——以报纸为平台在中共政权与根据地社会之间寻求共识、实现共振、形成共震,从而谋求民众对中共的政治支持,无论使党的意志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还是使群众认识到自己利益并为之团结奋斗,最终都是为将边区群众改造成党领导下的人民,使中央的意志成为全党意志、使党的意志成为全民意志作准备。不以同呼吸共命运的政治共同体为目标,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均是无的放矢,群众路线亦毫无意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办报才能成为“深入的组织工作”。

参考文献

- 冯凯:《静宁通讯工作是怎样开展起来的?》,《抗战日报》1945年1月18日。
- 贺龙:《强有力的武器》,《抗战日报》1941年9月18日。
- 胡乔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抗战日报》1946年9月16日。
- 黄羨章:《高丽生,潮梅籍最著名的中共报人》,《梅州日报》2016年12月7日。
- 晋绥日报简史编委会(1992):《晋绥日报简史》,重庆:重庆出版社。
- 康溥泉(1984):《党报风格要代代传——〈晋绥日报〉报史座谈会侧记》,《新闻研究》第9期,转引自康溥泉(2005)《报坛六十年耕耘录(1)》,香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第313—317页。
- 康溥泉(2003):《革命熔炉——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史纪略》,《忻州文史》第2期,转引自康小明、康为民(2007)《报人楷模康溥泉》,香港:香港天马出版有

限公司,第310—324页。

康溥泉(2005):《报坛六十年耕耘录(3)》,香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康溥泉:《我对文化工作的反省》,《抗战日报》1946年2月4日。

康小明、康为民(2007):《报人楷模康溥泉》,香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李洪启(1987):《壮心未与年俱老——访廖井丹同志》,《中国记者》第1期,第44—45页。

李振水(1990):《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90》,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廖井丹:《抗战日报的一周年》,《抗战日报》1941年9月18日。

马明(1999):《山西新闻通讯社百年史》,北京:新华出版社。

穆欣(1939):《在敌后学办报——我和〈战斗三日报〉》,《新闻记者》第1期,转引自穆欣(1992)《抗日烽火中的中国报业》,重庆:重庆出版社,第366—376页。

穆欣(1961):《晋绥解放区民兵抗日斗争散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穆欣(1992):《抗日烽火中的中国报业》,重庆:重庆出版社。

穆欣(2007):《难以忘怀的记忆——悼念廖井丹同志》,《党史文汇》第10期,第30—32页。

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1985):《战斗的号角》,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等(1997):《晋绥边区出版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岳谦厚、董春燕(2009):《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安徽史学》第1期,第35—44页。

张稼夫口述,束为、黄征整理(1984):《庚申忆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1989):《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03):《常芝青传》,北京:新华出版社。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抗战日报》1942年10月20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